

郭店楚简《忠信之道》简论

李 刚

(西北大学思想所,陕西 西安, 710064)

[摘要]《忠信之道》是郭店楚墓竹简中很有特点的篇章。它把忠信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突出了忠信的实质和意义,是先秦思想史上忠信问题的专论。郭店楚简《忠信之道》的发现,使先秦儒家的演进更为清楚。它主张的忠信治民的君子之道,有道家思想的影响。《忠信之道》可能与孔门后学子张之儒有直接的关系。

[关键词] 楚简《忠信之道》; 忠信; 儒家; 道家; 子张氏之儒

[中图分类号] Z423.1 **[文献标识码]** A

On the Guo Dian Bamboo Slips “the Dao of Loyalty and Faith”

LI Gang

(Thought Institut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4, China)

Abstract “The Dao of Loyalty and Faith” is one of the special article in Guo Dian Bamboo Slips. It is a specialized article on loyalty and faith in the history of thought of pre-Qin which improves the problem of loyalty and faith a new height and stresses the meaning and essence of loyalty and faith. Its discover mak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ought of the Confucianists clear. Its thought of ruling people by the Dao of loyalty and faith includes the fluence of the Daoists. It relates directly to the doctrine of “Zi Zhang”.

Key words bamboo slips “the Dao of Loyalty and Faith”; loyalty and faith; Confucianists; Daoists; doctrine of “Zi Zhang”

郭店楚墓竹简于 1993年冬出土于湖北省荆门市郭店 1号楚墓。1998年 5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图片和释文,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些楚简有 800余枚,用典型的楚国文字写成。据整理考证,其年代大约为战国中期偏晚。各篇原来没有篇题,现在的篇题是由编者拟加的,共 16篇。其中《老子》和《太一生水》为道家作品,其余多为儒家学派的作品。《老子》《周易》《五行》与传世文献大体相同,其他篇章多为珍贵的佚文。郭店楚简的整理和出版,打破了许多传统的看法,为重新认识先秦思想史特别是儒道两家及其关系等,提出了非常重要的线索。本文试从《忠信之道》来对这些问题做些初步的分析。

[收稿日期] 2000-01-03

[作者简介] 李 刚 (1967-),男,陕西商州人,博士生,从事思想史研究。

“忠”和“信”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两个基本范畴,在儒家典籍中出现的次数最多,位置也最为重要。就《论语》说,“忠”出现了 18 次,“信”出现了 38 次;《孟子》中“忠”8 见,“信”38 见;《十三经》中“忠信”连用至少有 12 次;《郭店楚墓竹简》有 35 个“忠”字,52 个“信”字。这在 13 000 余字的楚简中,其位置的重要,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系统而专门的论述,却是从郭店楚简《忠信之道》开始的。

“忠”字的基本含义,《说文》解释为:“忠,敬也”。“信”字《说文》解释为:“信,诚也。”^[1]可见,“忠”与“信”字本来就是近义词,故经常连用。南宋理学家朱熹在注解《四书》时说:“尽己之谓忠;以实之谓信”。^[2]“忠是实心,信是实事”。^[3]陈天祥《四书辨疑》概括地说:“盖忠当以心言,信当以言论。心无私隐之谓忠,言有准实之谓信。此乃忠信之别也。”^[2]这些简明扼要的解说,准确地道出了忠信的基本性质。简单地说,忠信代表着实事求是,因是是一种心地无私、言而有信的高尚品质和行为。正如皇侃在疏解《论语·学而》时说的:“以忠信为百行所注,是言忠信在己不在人”。^[4]这是对《论语·学而》“主忠信”^[4]的准确解释。由此可见,忠信代表的首先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自主原则。千百年来,儒家有兴衰沉浮,但忠信的品行却倍受重视,这和忠信的政治和社会价值是分不开的。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中,“忠”字多有“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4]的含义;“信”字后来被用作五伦之末的“朋友有信”^[4]。但在先秦时期,其含义还是比较广泛的。

在《忠信之道》中,忠信既不是一般的道德规范,也不是对庶民提出的伦理要求,而是对统治者提出的政治伦理理想。在《论语·学而》中,孔子曾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4]据黄式三的《论语后案》:“陆稼书说:‘敬是遇事谨慎之意,不必言包括众善。信者不用权诈,不朝更夕改,惟此真确之诚,表里如一,始终如一。’”^[3]孔子的这一思想,被《忠信之道》所继承。孔子又认为:“言必信、行必果,然,小人哉!”^[4]这一方面把信从属于更高的原则,但另一方面也是力图超出“小信”的范围。《忠信之道》把这一思想发展成了“大信”思想。

《忠信之道》所标举的君道,在郭店楚墓竹简中倒很多见。《衣》说:“大臣之不亲也,则忠敬不足,而富贵已过也。”君子忠敬不足,故须“信以结之,则民不倍”。^[5]《成之闻之》也说:“古之用民者,求之于己为有恒。行不信则命不从,信不著则言不乐。”^[5]《尊德义》也强调“忠信日益而不自知”^[5]则“民进善矣”。^[5]《语丛一》说的更为清楚:“由中出者,仁、忠、信。由外入者,礼、乐、刑。”^[5]上下皆得其所之谓信。”^[5]这些思想,与《忠信之道》是相近的。但《忠信之道》却是忠信思想的专门论述,自有其独特之处。

《忠信之道》不是泛泛地论述忠信,也不是就一般的忠信来阐述的。它所论述的忠与信,是“至忠”、“大忠”、“至信”、“大信”,而不是小忠、小信;它不是描述至忠至信的具体表现,而是揭示其性质、核心和意义。因此,《忠信之道》是忠信问题的形而上学;编者所加的篇题,是恰到好处的。《忠信之道》认为:“不伪不害,忠之至也。”^[5]“至忠如土,为物而不发”^[5]“至忠亡伪,大旧而不俞,忠之至也”。^[5]“不欺弗智,倍之至也”^[5]。“至信不背”^[5];“陶(?)而尚者,信之至也。”^[5]“至信如时,毕至而不结”。^[5]由此可见,《忠信之道》所论述的,是“忠之至”、“信之

至”,是“至忠”、“至信”。它与一般的忠信并不相同,而是“大忠不兑,大信不期”。因此,“忠,仁之实也。信,义之期也”。^[5]至忠至信是仁义的实质或核心要求。因而,至忠至信的社会作用是巨大的,即“忠积则可亲、信积则可信。忠信积而民弗亲信者,未之有也。”“₁₀(节)天地也者,忠信之谓此。”忠信有“不兑而足养,不期而可要”^[5]的效果,所以,“忠之为道也,百工不₁₁糴,而人养皆足;信之为道也,群物皆成,而百善皆立”。^[5]忠信的作用,几乎是无以复加的君子之道。遵守忠信之道的君子,是“忠人”、“信人”。忠人信人遵从忠信之道,就会庶民亲信,天下大治。《忠信之道》所主张的理想人格,是“忠人”、“信人”、“君子”,与孔子的主张不完全相同,但又明显地是孔子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4]、“博施于民而能济众”^[4]的理想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忠信之道》的政治理想,比起孔子,更富于理想主义。

二

《忠信之道》的主导倾向,属于儒家。它把儒家的基本范畴忠信,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思想高度。就拿忠信的基本含义来说,至忠至信思想,都和“实”与“诚”是分不开的。《中庸》和《孟子》所主张的“诚”,有了《忠信之道》,就不显得突然了。《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4]《中庸》的这一思想,我们在《忠信之道》中也已能看到:“不兑而足养者,地也;不期而可要者,天也。₁₀(节)天地也者,忠信之谓此。”^[5]忠信可以贯通天地,已多少具备了形而上的特征。《孟子》所说的“尽其心,则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4]的天人相通观念,大概是有来源的。《忠信之道》把忠信与天地相联系,这对后来的儒家思想,肯定是有影响的。

儒家的政治思想,历来以民本主义见称。《忠信之道》的民本主义思想,是和它的独特的政治视角分不开的。《忠信之道》所侧重的是君道,从忠信之德来要求统治者,并提出了系统的忠信之道,这在儒家思想发展中是有创见性的。所谓忠信之道,就是君子对民不欺不伪,不背不害,换句话说,君子要真诚地对待民众,尊重他们,言而有信。全篇虽没有言及“人”、“民”的地位,但字里行间却渗透着对民众的关怀和重视,而不是沽名钓誉的安抚;要求以公心对待民众,而不是出之以私心。这既是对孔子礼治思想的继承,更是对原始民作遗风的高扬。忠信只不是一种统治术,更是“君子”应有的修养。因此说“□惠而实弗从,君子弗言尔;心□□□亲,君子弗申尔。故行而靖兑民,君子弗由也。三者,忠人弗作,信人弗为也。”^[5]可见忠信并不只是一种政治手段。若联系楚简《唐虞之道》,这一点就更清楚了。《唐虞之道》与《忠信之道》,竹简的形制基本相同,思想也比较接近,它主张“爱亲尊贤”。^[5]但在爱亲与尊贤之间,又主张“禅而不传”^[4]的原则,要求“圣人”“利天下而弗利也”。《忠信之道》所要求忠人信人的,正是“利天下而弗利也”的精神。许多学者也因此而把这两篇划为一类;杜维明还把这两篇称作“儒家的理想主义”。^[6]

的确,《忠信之道》有着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本篇所说的忠信,是大忠、大信,是忠之至,信之至,非一般“君子”所能企及。忠信是由中出者,在人不在物,全靠君子的自觉。另一方面,“忠信积而民弗亲信者,未之有也。”“忠之为道也,百工不₁₁糴,而人养皆足。信之为道也,群物皆成,而百善皆立。”^[5]《忠信之道》的作者,对忠信之道的效果充满了理想主义的自信。这是

儒家典型的内圣开出外王的思路。

在儒家学说中,圣人、君子是理想的人格形象。但在《忠信之道》中,“忠人”、“信人”是理想人格,这和孔子以及后来的儒家思想很不一样。“忠人”、“信人”不是一般的君子,而是至诚不欺、利天下的君子,有公而忘私的精神。这种理想人格,更接近于儒家学说中的三皇五帝的形象。比起“圣人”来说,“忠人”、“信人”似乎没有那么高不可及,但却显得更为实在。有着积忠信而亲信万民的实际作为,平凡而伟大。

《忠信之道》有着一定的自然主义倾向。这一方面是儒家的一些思想走向极致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能看出一些“儒道相谋”的倾向。

三

在荆门的郭店楚墓竹简中,《老子》与《忠信之道》同时出现。大体来说,《老子》可能要早于《忠信之道》。二者也都被用作东宫太子的教科书。还是有相近的方面的。《忠信之道》没有出现“无为”一词,但却有这种倾向。从现有的文献来看,“无为”思想并不是道家专有的。《论语》中,孔子就说过:“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尧之为君也,恭己正南面而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4]当然,这些都是孔子推崇的理想政治方式。《忠信之道》正是孔子“无为”理想的新发展。我们也可以大胆推测,《忠信之道》也许受了墨家兼爱学说的影响,才把孔子的仁爱学说发展成了“利天下”^[5]的忠信之道的。从下面的事实,可以推测《忠信之道》受到了道家特别是《老子》的影响。

首先,从句例看,《忠信之道》有“大忠不兑,大信不期”,《老子》有“大制不割”^[7]、“大象无形”^[7]、“大方无隅”^[7];《忠信之道》有“至忠如土,为物而不发;至信如时,毕至而不结”,很接近于《老子》^[5]。“万物作而不为始也,为□而弗恃居”^[5],《忠信之道》有“忠之至”,《老子》有“和之至”。反复诵读,不但能看到二者的文法相近,而且也能感觉到二者的口气风格也是有更多相似之处的。其次,《忠信之道》反复申说“至忠如土”、“至信如时”“□(节)天地也者,忠信之谓此”。这种说法,多少有些道家的色彩。也有道家的形而上学特点。再次,《忠信之道》中的“忠人”、“信人”行忠信之道,不求悦民,反而要求表里如一、言行一致。这与《老子》的自然主义特别是“为而不恃”的精神是相近的。最后,就忠信而言,今本《老子》有“夫礼者忠信之薄”^[7]的话,更说明了二者的联系。儒家的仁、礼都被道家否定了,但道家又给了“忠信”的很高位置。这可能是“忠信”所代表的真实无私之意,接近于道家的自然主义。“夫礼者忠信之薄”^[7],反过来可以说忠信者礼之厚。《忠信之道》说“忠,仁之实;信,义之期。”^[5]这在说法上与《老子》也是相通的,尽管二者在根本立场上是不同的,但却不能排除《老子》对《忠信之道》的影响。若进一步和《庄子》联系起来,这一点就更为清楚。

四

《忠信之道》出于楚简,又受到《老子》的影响,很可能与南方的楚文化有一定关系。但它既然是儒家之作,更可能与孔子的弟子和后学有关。在孔子的弟子中,曾子和子张最重忠信问题。曾子是北方人,与《忠信之道》的思想也相差达远。子张一则是南方陈人。二来最重视忠信问题,与孔子讨论这个问题比其他人多。《论语·卫灵公》有这样的记载:“子张问行。

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5]子张把忠信书诸绅,自然永记不忘,更何况亲自聆听了孔子的多次教诲。《论语》的记载中,孔子的高徒,子路出现了 47 次,子贡 44 次,子张和子夏都是 23 次。子张有如此高的位置,由他及其弟子后学写作《忠信之道》,就不奇怪了。《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都记载了“子张之儒”。《史记·儒林传》说“子张居陈。”^[8]陈、蔡一带,一直受楚的影响和制约。《大戴礼记·将军文子》中,子贡评价子张说:“业功不伐,贵位不善,不侮可侮,不佚可佚,不傲无告,是顓孙氏(子张)之行也。”^[9]子贡的评价,和《忠信之道》在语句上是相近的,在宗旨上大体是相同的。因此,《忠信之道》很可能是子张及其弟子后学的作品。

[参考文献]

- [1] 朱骏声. 说文通训定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2] 程树德. 论语集释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 [3] 姚永朴. 论语解注合编 [M]. 合肥: 黄山书社, 1994.
- [4] 阮元编. 十三经注疏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 [5] 荆门市博物馆. 郭店楚墓竹简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8.
- [6] 姜广辉. 中国哲学(第二十辑) [C].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9.
- [7] 高明. 帛书老子校注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 [8] 司马迁. 史记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9] 王聘珍. 大戴礼记解诂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